

· 英美文学研究 ·

# 十九世纪社会转型期的纽约市

## ——《华盛顿广场》和《豪门春秋》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卫朝霞 王芳 靳蓉

(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西安 710049)

**摘要:**《华盛顿广场》和《豪门春秋》分别是美国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和伊迪丝·华顿的早期代表作。作品问世以来,学术界对这两部小说的研究大多着重于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然主义等阐释。本文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将19世纪转型期的纽约市作为文本而不是“背景”进行诠释:詹姆斯和华顿通过记述19世纪两大转型期纽约的阶级分布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巩固了当时历史语境下的主导权力话语;作家的个人意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抵牾,体现了两位作家颠覆权力话语的创作倾向;但作家的反抗最终还是受到了主导权力话语的遏制。

**关键词:** 纽约; 亨利·詹姆斯; 伊迪丝·华顿 《华盛顿广场》; 《豪门春秋》

**基金项目:** 西安交通大学2009年校内科研基金自由探索资助项目(sk2009064)

19世纪初的纽约虽然已是当时美国最大、最富有的城市,可是,处于萌芽期的大都会此时仅仅占据了曼哈顿南端的一小片地区,狭小的空间内,肮脏杂乱的小巷子纵横交错。纽约的这种城市格局不仅极大危害了公众健康,交错无序的街道规划势必也将阻碍未来的城市和经济的发展。为改善这一状况,1811年的“纽约市政规划”制定出未来曼哈顿的城市发展模式:以阿拉伯数字命名的街道将呈网状格局由南向北,由东及西逐年推进。<sup>①</sup>这个规划不仅避免了类似下城老区杂乱无章的街道布局,指定城市未来由南向北的拓展方向,更重要的是为19世纪纽约经济的迅猛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整齐划一的城市规划在客观上却破坏了城市原有的宁静、灵动的自然风貌。一条条大同小异、僵化乏味的街道遭到当时纽约传统贵族的猛烈抨击。随着城市地理格局的改变,原有的社会格局也受到强烈冲击。当时还处于财富积累期的资产阶级新生势力觊觎旧有势力的地位和财富,二者矛盾日益加深。

纽约19世纪独特的城市和社会巨变深深吸引了两位生于纽约、长于纽约的美国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和伊迪丝·华顿同时关注到了处于转型期的纽约市,并在他们的早期代表作《华盛顿广场》(1881,以下简称《华》)和《豪门春秋》(1905,又译为《欢乐之家》,以下简称《豪》)<sup>②</sup>中分别再现了19世纪中叶和世纪之交时纽约的市貌和社会变化,以及这些变更在她们所熟悉的纽约社会引发的震荡。

① Edward K. Spann, "The Great Grid: the New York Plan of 1811," Daniel Schaffer (ed.), *Two Centuries of American Planning*,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8.

② 两书的中文版均已出版。本文对两书的所有引文分别出自:亨利·詹姆斯《华盛顿广场》侯维瑞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2年;伊迪丝·华顿《豪门春秋》张澍智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9年。

在美国文坛,詹姆斯和华顿的经典地位毫无争议。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曾指出,在美国屈指可数的几位卓越小说家中,詹姆斯和华顿无疑是两位杰出的美国小说大师。<sup>①</sup>自《华》和《豪》问世以来,西方学者对这两部小说的研究大多着重于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自然主义等阐释。国内学者对两部作品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末侯维瑞、张澎智先生分别将两部作品引入我国,国内文学评论界对《华》和《豪》才开始了真正的研究。可是,由于受西方学者的影响,我国学者对两部作品也多以上述研究角度为切入点。进入21世纪,国内外学者对两部作品在研究视阈上有一定拓展,主要表现在反女性主义、种族主义批评、消费主义、文化蕴涵批评等批评理论的关照。可是,无论从何种视角剖析两部作品,学者们的关注焦点往往是小说的人物性格特点、情节结构或写作技巧,仅有的一些针对纽约社会的研究也仅仅将纽约作为作品的“背景”,少有论著将小说中19世纪转型期的纽约市作为阐释的重点,将当时纽约的城市版图扩张和社会阶级分化作为研究对象。此外,针对两位作家如何透过记述19世纪纽约巨变(地理和社会层面),展示各自深刻的政治社会认识,揭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以此表达他们对主导话语的抵牾,国内外评论界也较少涉足。

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欲借助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理念,打破文学和历史之间所谓的“前景”与“背景”的传统关系,将《华》和《豪》中19世纪两大转型期的纽约市拖入研究的“前景”,把这一历史语境下的纽约作为文本进行诠释。本文将比对分析两位作家是如何独具匠心地将当时纽约的阶级分化和曼哈顿的网式街道规划巧妙地结合在各自的作品中。此外,本文还将运用新历史主义“权力话语”和“巩固、颠覆与抑制”的概念,剖析詹姆斯和华顿在作品中流露的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既迎合又反叛的矛盾心理。指出他们的作品一方面渲染、巩固了当时经济发展和阶级分化这一主导权力话语,而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们对当时权威意识的质疑和颠覆意识,以及这些抗争是如何最终受到权力的遏制的。

## 一、纽约情结

新历史主义旗手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J. Greenblatt)指出,新历史主义实践的目的在于同死者对话。<sup>②</sup>那么,如何透过文本与逝去的作者对话,理解作家想说些什么?如何知晓他们在作品中所说的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意味着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特别注重阐释语境的理解和分析。在张京媛提出的新历史主义三层基本阐释语境中,“写作的语境”首当其冲,其次才是“接受的语境”和“批评的语境”。然而,由于我们无法直接了解写作的语境,所以只能通过流传下来的文本资料重建这一语境,从而了解“作者的意图、传记、社会文化、政治境遇和它们的意识形态与话语”。<sup>③</sup>

出生于19世纪中叶纽约传统贵族家庭的詹姆斯和华顿对他们幼年生活过的纽约下城情有独钟,对转型前的老纽约社会无比留恋,对发生在他们身边的经济、社会变革又充满无奈、不满和抵触之情。尽管成年后两人都选择逃离美国,旅居欧洲,但社会变革前纽约的形象早已深深凝刻于他们的脑海之中。

1843年,詹姆斯出生在离华盛顿广场仅几步之遥的一幢赤褐色小楼中。在此后的12年

① Gore Vidal, "Of Writers and Class: In Praise of Edith Wharton," Carol J. Singley (ed.), *The Age of Innocen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0, p. 449.

②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页。

③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6页。

间,他亲眼目睹了华盛顿广场如何在纽约的城市、经济扩张中,由一个拥有当时最优雅的私人住宅样板区,逐渐蜕变成为混乱的商业中心。<sup>①</sup> 1855年之后的华盛顿广场已不再属于詹姆斯,随着他居住的那幢小楼一起消失的还有纽约旧有的宁静、传统和质朴。

当华顿于1862年出生在毗邻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广场的西23街上的一幢豪宅时,纽约的网状街道发展在19世纪中叶的经济腾飞中已初具规模。为躲避经济危机和内战,华顿四岁时随父母旅居欧洲六年,直到1872年才返回纽约。此时,世纪之交的曼哈顿下城早已不再是华顿家族17世纪荷兰移民祖先曾居住的幽静乐园,它已变成喧嚣的经济中心和繁乱的新移民聚集地。金融投机者、冒险家和社会底层人群不断涌入这个区域,逼迫恐慌不已的华顿家族再次北迁。华顿为1936再版的《豪》作序时曾表明,“是一种强烈的冲动,一种希望由一位像我这样的成长在传统习俗温室中的作家,再现19世纪90年代纽约的冲动,促使我创作了这部作品”。<sup>②</sup>

尽管两位作家年龄相差近20岁,但詹姆斯不仅是华顿最好的朋友之一,同时对她的文学事业也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当时的文坛就评说华顿文笔之细腻精致,几乎是詹姆斯的女性继承人。当然,一些批评家根据对詹姆斯后期作品所影射的猜测,也发出过不少质疑这种友谊的声音。认为华顿接近詹姆斯是为了借用他在文坛上的影响力,而詹姆斯对华顿远胜自己的声誉也曾嫉妒不已。<sup>③</sup> 然而,从1900至1916年,即詹姆斯去世前十几年间二人往来的书信中不难看出,华顿文学创作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多半应归功于詹姆斯的鼎力帮助。更值得一提的是,詹姆斯曾多次鼓励华顿关注他们所熟悉的“纽约题材”。在一封1902年写给华顿的信中,詹姆斯力劝华顿纽约才是她展示才华的最佳选题,并急呼“写纽约吧”(“DO NEW YORK!”)! 在华顿创作《豪》期间,詹姆斯返回阔别多年的美国,并和华顿相处数月。阅读完刊登在1905年《斯克里布纳》11期上的《豪》后,詹姆斯急忙致信华顿“对丽莉·巴特的成功塑造表示祝贺和赞美”。<sup>④</sup> 这些珍贵的史料都毋庸置疑地佐证了两位作家对19世纪纽约城市和社会巨变的关注。创作于这一写作语境下的《华》和《豪》也无疑都被打上了“纽约小说”的深深烙印。19世纪的纽约市成为作家创作再现的共同主题和重点。

## 二、“二元”网状城市

在《华》和《豪》中,詹姆斯和华顿分别刻画了19世纪中叶经济腾飞的纽约和世纪之交已确立经济霸主地位的纽约。作家通过描述作品中主要人物的住宅位置和活动范围,揭示这些地理方位在当时纽约城市版图上的独有蕴意,为读者呈现出一个“二元”的网状城市:南北纵向来说,它为上流社会提供了一个展示财富、炫耀奢华的平台;东西横向来说,它又是一个阶级排斥的场所:下层社会的穷人在现实生活中被真实地边缘化在曼哈顿沿河的两边,与位于城市中心的百老汇和第五大道的富人区形成鲜明对比。纽约网状街道的格局在改变城市地貌的同时也深化了阶级差异。城市由南向北扩展的同时也是阶层自下而上流动,朝上流社会爬升的

① Kenneth A. Scherzer, *The Unbounded Community: Neighborhood Life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New York City, 1830 - 1875*,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2.

② Edith Wharton, *Uncollected Critical Writing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65 - 266.

③ Victoria Coulson, *Henry James, Women and Re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41 - 143.

④ Lyall Power (ed.), *Henry James and Edith Wharton: Letters, 1900 - 1915*,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0, p. 34.

方向。由于“文学作品也和其他的语言行为一样,均和当时的社会情境脱不了关系,绝不唯美和超越。”<sup>①</sup>因而,出身纽约上流贵族的两位作家都赋予了各自作品浓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色彩。他们在描述 19 世纪两大社会转型期纽约市的城市格局和社会阶层巨变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渲染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和阶级分化这一主导权力话语。同时,由于文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的“社会效果”是“巩固、颠覆与遏制”,<sup>②</sup>所以,詹姆斯和华顿的这一系列描述不仅再现了 19 世纪纽约的发展史,同时也顺应并巩固了当时的权威话语,体现出他们对主流意识的迎合和委从。

《华》中的纽约是 19 世纪中叶前的纽约,是经济迅猛崛起之前、给詹姆斯留下深刻童年回忆的纽约。小说的前三章几乎就是纽约城市拓展起步阶段的编年史,也是对当时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渲染。詹姆斯的故事始于 1820 年,此时的纽约仅仅是“菌集在曼哈顿岛南端炮台公园一带”(第 2 页)的小城。饱经世故、老谋深算的男主人公斯洛泼医生婚后选择住在离市政厅仅 5 分钟的一条街上,直到 1835 年周边尖利的商业喧嚣逼迫他向北迁至华盛顿广场,一个暂时“静谧优雅、可以幽居的住处”(第 12 页)。小说中斯洛泼医生两次精心选择住所的情节,恰恰与纽约 19 世纪中叶前的城市拓展相吻合。历史上,华尔街 1835 年的一场大火使住在周围的贵族们心惊胆战,而重建后日益繁荣的商贸活动又不断侵扰他们幽静的生活,使他们更加不安和恐慌。斯洛泼医生举家北迁是当时大多数贵族选择的逃避途径,也是纽约传统贵族在网状格局街道开始建设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北迁。

仿佛男主人公的住所搬迁史不足以充分再现当时纽约的城市拓展模式,詹姆斯又很快安排斯洛泼医生的侄女婿亚瑟在一次家庭聚会上侃侃而谈纽约贵族的时髦生活:住在纽约就要“三、四年搬一次……城市发展得这样快,你得不停地赶上时髦才是”。年轻夫妇们应该遵循“继续北上,不停向上”的吉利格言(第 22-23 页)。“不停向上”的确是当时上流社会的座右铭,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因为只有不停向北、向上,才能继续传统的贵族生活,也才能在社会巨变中坚守住已有的上层地位。

《华》中的这些地理位置不仅再现了纽约 19 世纪中叶城市和社会的巨大变化,而且还肩负着暗示人物社会地位和阶级等级的使命。新历史主义批评者认为,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当时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诸种因素交错作用的结果。而“任何文学文本的解读在放回到历史语境中的同时,就放回到‘权力话语’结构之中”。<sup>③</sup>因此,阶级关系作为权力话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常常成为批评者们重要的诠释对象。

尽管在《华》中,纽约的传统社会秩序已经受到新生产产阶级的强烈冲击,但新的阶级模式还没有形成和固化。小说中人物的居住位置不仅足以表明居住者的身份地位,也足以记录 19 世纪中叶纽约的城市格局和阶级分布的关系。而作家对这一契合关系的揭示,也是对当时权力话语的某种渲染和巩固。对斯洛泼医生来说,网状街道就是一个判断人们社会地位的标准仪。他也常常借助这些地理方位诠释这一复杂关系。在这架南北方向的巨型阶梯上,梯子格挡越向北,社会地位就越显高贵。斯洛泼医生居住的华盛顿广场,在当时依旧是上流社会的象征。医生最喜欢的妹妹、殷实富足的艾尔蒙德太太家周围,则呈现出一派当时少有的田园风光,显然她的地位和财力能够跟得上她女婿预言的“继续北上”,能够在社会巨变中保持向上

①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 254 页。

②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第 196 页。

③ 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3 期。

的势头。但作者笔下的财产猎取者、莫里斯·汤森德姐姐家所在的第二大道,几乎紧靠东河。这个位置和那座质朴的红砖小屋,使得斯洛泼医生立刻对汤森德的拮据家境了如指掌,进而证实了汤森德攫取财富的野心。

正如凯瑟琳在小说结尾时选择固守华盛顿广场,詹姆斯的纽约也凝滞在19世纪中叶。那时的纽约上城还未完全开发,农庄、商业用地、政府用地虽然犬牙交错,但依稀仍保留一些田园风光。<sup>①</sup>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纽约经济金融空前繁荣,经济霸主地位正式确立。此时纽约网状街道规划已全部开发完毕。东西十二条大道和南北155个小街将它大致格成2028个大同小异的街区。<sup>②</sup>象征着贵族生活的田园风光逐渐消失,嘈杂的经济活动和财富觊觎者的不断入侵,逼迫纽约的上流社会继续向北寻求新的居住地。

此时的纽约贫富差距更大,新贵旧豪、上下层社会关系更复杂,阶级流动更加困难。从前居住在曼哈顿下城的老牌绅士阶层纷纷逃离下城的华盛顿广场,选择靠北的麦迪逊广场和中央公园两侧定居。除第五大道外,不远处的百老汇大道两侧也展列着纽约精英阶层华丽的住宅。这些设计新颖、正面镶以大理石的华厦与东西两侧仅几个街区之隔的房屋形成鲜明对比。再向东、向西,靠近两河附近,居民的社会地位则急剧下降。大卫·斯科比(David M. Scobey)曾举例描述当时这一独特的城市现象:游人沿第42街,从中轴线——第五大道向西横穿曼哈顿,他们首先看到的是第五、六大道上的棕色花岗石连栋住宅;酒店、教堂、骑术学校渐渐出现在第七、八大道;而第九大道和哈德逊河之间的街区则充斥着工厂、廉价公寓、甚至屠宰场。<sup>③</sup>世纪之交的曼哈顿就像一块阶级三明治,社会等级从两河开始,向东向西逐阶升高,直到城市中轴线上的新贵旧豪。

和詹姆斯的作品一样,《豪》中也记录了纽约世纪之交时的都市风貌和阶级分布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复杂关系的描述中,也同样渗透着在当时社会语境下占主导地位的权力话语。然而,华顿笔下的人物住所及其活动场所较之《华》更具体、更明确。一扫《华》中社会阶层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华顿将曼哈顿上城的阶级分布一一精确定位在她的作品中。这样的描述,一方面呈现出业已成型的纽约网状街道布局和社会阶层模式的逐渐固化状态,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当时主宰个人意识的主流意识形态较之19世纪中叶更具体,更强大,两种话语的冲突也更强烈。

《豪》中的所有上流社会家庭都聚居在第五大道上城部分的周围。出身于老牌贵族的男主人公赛尔登尽管家道中落,但仍可享受位于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大街之间本尼迪克大楼的一套公寓。当时,这座拥有大理石阳台和乔治亚式楼面的建筑,以居住纽约精英阶层的单身男性而闻名。麦迪逊大街上的另一位单身贵族的纽约府邸——波西·古莱的棕色住宅,也颇受众多希望钓到金龟婿的上流社会名媛的关注。小说的女主人公丽莉在被剥夺继承权之前,大多时候寄居在姑妈彭尼顿太太家。这位荷兰贵族后裔属于典型的“老”老纽约旧家族阶层。<sup>④</sup>每年10月,当上流社会一年一度的社交季揭开帷幕时,彭尼顿太太会准时从新泽西的庄园返回

① David M. Scobey, *Empire City: The Making and Meaning of the New York City Landscap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31.  
 ② Edward K. Spann, "The Great Grid: the New York Plan of 1811," Daniel Schaffer (ed.), *Two Centuries of American Planning*, p. 16.  
 ③ David M. Scobey, *Empire City: The Making and Meaning of the New York City Landscape*, p. 118.  
 ④ Lillians Robinson, "The Traffic in Women: A Cultural Critique of *The House of Mirth*," Shari Benstock (ed.), *The House of Mirth*, Boston and New York: Bedford Books, 1994, pp. 340-358.

第五大道靠近中央公园的住宅。另外,在这条中轴线上,依次还能看到犹太暴发户罗西德,“新”老纽约贵族雷诺和新贵百利家族的宅邸。与“老”老纽约贵族彭尼顿太太的住宅不同,这三位豪宅极尽奢华,第五大道成为他们比拼资产、炫耀财富的舞台。

与这些特权阶层的住宅相比,生活在社会夹缝以及社会底层人群的居所则被边缘化在中轴线两侧,逐渐向两河靠近。这些住所真实地反映了他们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以及被边缘化的权力话语。赛尔登的表妹法里丝小姐尽管经济拮据,但由于和富人沾亲带故,在离第五大道不远处的一栋公寓楼中也有一个房间。可它矮小逼仄,远不能和本尼迪克的房间相比。丽莉曾帮助过的女工、属于社会底层的妮其一家,住在第八、九大道之间的一幢廉价公寓楼中。丽莉被上流社交圈迫害并抛弃后,为了重返那个时髦社会,起初还能勉强负担得起离富人区不远的一家私人旅馆。后来由于生计所迫,她便搬到一家商务旅馆,帮助来自西部、携带不明巨款的哈琪太太进入上流社会。但出身传统社会的丽莉对当时根本不被时髦社会所接受的纽约旅馆生活也充满厌恶。当她最终跌入社会底层,与一群女工在阴暗潮湿的小作坊缝制女帽维持生计时,她搬到了下城西区的寄宿舍中。这片区域上有高架火车的轰鸣声,周围有电车和火车的隆隆声。连犹太新贵罗西德都无法相信他心目中的女神最终会沦落到这样一个丑陋所在。随着丽莉从老纽约的社交圈滑到新纽约的社交圈,再滑入暴发户的社交圈,最后沦落到社会底层,她屡次被曾经熟悉的宅邸拒之门外,最终跌入谷底。在女帽店干完一天的苦役向寄宿舍走去时,“她走过一条条纽约的街道,从高级住宅区渐次降级来到商业区,每走一步都令她痛心。”(第317页)

### 三、颠覆大都会

如果说詹姆斯笔下的纽约,是一个19世纪中叶小规模“二元”网状城市,那么,华顿的纽约则是他的扩大版:城市版图向北快速扩展的同时,社会阶层分化也更加显著。除了渗透在对人物住所的一系列记述中的服从和恭顺外,两部作品的字里行间还隐隐流露出作家对周遭巨变的迷茫和抵触,表达了他们试图消解中心意识形态并重塑个人意识的愿望。

格林布拉特在对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关系理论和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理论所做的进一步阐释中指出,在特定时代社会的权力话语体系中,主导意识形态制约了个体权利的行为方向。但人们,尤其是作家的人格力量和内在自我与这一意识形态往往并不保持一致,有时甚至表现出彻底的挑战和反叛。然而作家的反叛并不体现于“在现实世界去颠覆现存的社会制度,而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则加以质疑”。<sup>①</sup>

因此,尽管由于无法摆脱上流社会出身和周遭主流意识形态氛围的影响,詹姆斯和华顿在作品中渲染了纽约19世纪转型期经济迅猛发展和社会阶层加大分化这一主导权力话语。但作品中人物居所和活动场所的巧妙设计同样也体现了他们与主导意识形态相抵牾,并且试图消解、颠覆权力话语的意图。

在《华》中,詹姆斯有意模糊了除华盛顿广场之外的所有场所。这些不确切的地点一方面真实表现了纽约19世纪中叶城市发展的初期状态,另一方面,詹姆斯通过淡化除华盛顿广场之外的其他地理概念,表达出他对纽约巨变的不满和反抗,从而消解、颠覆了当时的权威话语。

<sup>①</sup> 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小说中,华盛顿广场是唯一一个作者精心描绘的地方。从第三章开始,詹姆斯就用一大段充满怀旧情绪的文字仔细描述当时的广场。这里绿荫苾苾,和谐宁静,尽管已成为城市中轴线的起始点,它依旧充满“柔情”。那种“安闲的情调,在这个……充满尖啸声的城市中是少有的”(第12页)。但是,随着情节的展开,詹姆斯对其他住所的介绍仅寥寥数笔,并且都只有一个模糊的方位:汤森德的姐姐住在第二大道;汤森德后来上班的营业所极难找,街道拐角处有“大块空地,连街沿也没有铺好”(第146页);斯洛泼医生不甚喜欢的妹妹、佩尼曼太太约汤森德见面的牡蛎馆在荒凉冷落的第七大道上,“路灯稀疏的街沿上到处坑坑洼洼”(第88页);即使埃尔蒙德太太家也仅仅介绍成“还要继续往北……街的号码大得很”(第13页)。詹姆斯在作品中对这些地理方位的刻意安排和逐渐淡化,不仅再现了纽约网状街道发展早期的不成熟状态,而且也突出了作者对旧有秩序的依恋和他对社会变革的迷茫以及试图消解主导权力话语的努力。

《华》和《豪》中,作家试图颠覆权力话语的姿态还体现在他们对纽约街道场景的运用上。斯科比曾明确指出,1811年市政规划下纽约城市街道的开发,扰乱了富有阶层的传统生活模式,极大地模糊了“以街道活动为代表的公共场所和以家庭生活为代表的私人领地之间的界线”。<sup>①</sup>经济蓬勃发展时期,纽约街道上发生的一切赤裸裸的商业活动就是对上流文明生活无休止的威胁。而这些活动所预示的社会、经济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中权力的交叠变更,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威胁。街道上频繁出现的新生事物、下层人群和各种机遇,也暗藏诱惑和威胁。所以,上流阶层逃避街道。在他们眼中,贵族女性出现在街道上显然比男性面临更大的危险。

因此,詹姆斯将《华》中人物的活动场所,特别是女性人物的活动范围,大都限制在室内。小说中凯瑟琳的活动几乎都被局限在居室的客厅里。除了去姑妈家和由父亲陪伴的欧洲之旅外,凯瑟琳几乎足不出户。无论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汤森德如何恳求,希望能在客厅之外的地方见她一面,即使在家门外的广场上,她也认为情人是在故意嘲笑她,片刻犹豫之后最终还是选择在家里的客厅与他见面。《华》中的女性人物中只有佩尼曼太太两次出现在纽约的大街上。詹姆斯介绍说,由于她年轻时不慎嫁给了一个体弱多病的穷困牧师,生活潦倒,牧师不久去世,医生就将寡居的妹妹接至家中与女儿为伴。作家笔下的这位太太显然不属于上流社会。可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出现在大街上,也要遮遮掩掩:第一次为去那个牡蛎馆,她得用厚厚的面纱把脸罩上,因为那里不仅天寒风大,还要防御街道上游逛的爱尔兰移民的滋扰。第二次去汤森德的事务所,她得用一个大手袋作掩护,尽量把自己打扮得像个普通妇女。由此可见,19世纪中叶的纽约街道绝不是上流社会名媛随意踏足的地方,而作家对纽约的城市扩张,对无休止的经济发展的抵触之情也跃然纸上。

詹姆斯的女主人公绝不独自涉足纽约街道,她被层层帷幔保护在华盛顿广场的老屋里。而华顿则运用街道在小说中的出现频率,以及街道与女主人公命运千丝万缕的联系,来消解当时的权力话语。

世纪之交的纽约街道也是华顿唯恐避之不及的场所,所以纽约的街道对丽莉来说从来都不是令人愉快的。小说中所有的大街(包括第五大道),在丽莉的经历中都不堪回首。它们有时拥挤不堪、令人生厌,有时陌生怪异,充满危险。华顿本人对周遭喧嚣街道的厌恶,还体现在她对丽莉街道活动频率的安排上。当女主人公游刃有余地穿梭在时髦社会的社交圈时,读者在纽约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丽莉。直到小说的最后几个章节,当丽莉被驱逐出上层社会社交

<sup>①</sup> David M. Scobey, *Empire City: The Making and Meaning of the New York City Landscape*, p. 174.

圈时,华顿才让她的女主人公频繁步行穿过不同街区,感受真实世界的风风雨雨,当然也感受网状街道和它们代表的不同阶层。可见,在华顿笔下,街道不再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中城市发展和经济腾飞的象征,而是丑恶、危险和苦难的代名词。

《豪》的最后几个章节中,读者看到丽莉频繁地出现在大街上。此时的女主人公为了生存,已沦落成一名女帽工人。每日上下班的途中,她都不得不穿过一条条熙攘丑陋的街道。四月下旬的某一天,失业的丽莉彻底跌入了社会谷底。夜晚街道的喧闹声和车轮的隆隆声使她彻夜未眠。为逃避廉价公寓杂乱的环境,一夜未眠的她来到第五大道上。此时,清晨刺骨的寒风使得纽约的街道犹如冬日般寒冷。当丽莉晚上再次出现在这条通衢大道上时,“大雨倾盆,冰冷的雨滴斜着拍落在她的脸颊上”(第334-335页)。浑身透湿的丽莉在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无处避身。赛尔登公寓的短暂温馨和妮琪小厨房的片刻温暖,都无法彻底将她拖离沉落的轨道。这朵温室中滋养成长起来的百合花,一旦被抛弃到纽约疾风暴雨的大街上,等待她的只有枯萎和死亡。

不难看出,詹姆斯和华顿在各自作品中,通过不同方式体现出他们对19世纪纽约社会转型期权力话语的抵触情绪和颠覆意识。但由于这种颠覆本身就是权力的产物,颠覆的声音产生于对秩序的确保,因而这种颠覆不仅不会侵蚀秩序的根基,最终还将受到权力的遏制。<sup>①</sup>面对强大的权力话语,詹姆斯只能让精明的斯洛泼医生拒绝继续北迁,固守华盛顿广场;让他钟爱的女主人公手拿绣针,独自在华盛顿广场老去。作为第五大道的起点,华盛顿广场既是詹姆斯与权力话语抗争的堡垒,又是他个人意识最终被遏制的场所。向北眺望,越来越多正面由棕色石头砌成的房子装点着第五大道,詹姆斯和他的女主人公却将自己封锁在华盛顿广场,是情有独钟,也是无奈的屈从。同样,华顿的不满和抗争也无法摆脱主流意识的统治。因为在华顿世纪之交的纽约,主宰个人意识的主流意识形态较19世纪中叶更强大,两种话语的冲突更强烈。因此,虽然针对权力话语的颠覆企图会更迫切,但也会更无力,个人意识也会受到更残酷的遏制。华顿让丽莉在纽约的廉价公寓悲惨地死去,既是她们的奋力抗争,也是权力话语对她们个人意识的残酷遏制。

19世纪变化中的纽约也吸引了一批与詹姆斯和华顿同时代的作家。其中,以纽约为题材的较有影响力的小说包括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Moby-Dick*, 1851),查尔斯·阿斯特·布里斯特德的《上流社会》(*The Upper Ten Thousand*, 1852),威廉·迪恩·豪威尔斯的《新财富的危害》(*A Hazard of New Fortunes*, 1890),斯蒂芬·克莱因的《街头女郎梅吉》(*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 1893)和亚伯拉罕·卡恩的《耶可》(*Yekl: A Tale of the New York Ghetto*, 1896)。尽管麦尔维尔和布里斯特德也都出身纽约上流社会,但他们对纽约的关照角度和批判程度与詹姆斯和华顿有所差异。《白鲸》中,纽约仅仅出现在作品的第一章节里。小说更多地体现了大海无法抗拒的魅力和海上的生活。麦尔维尔的纽约“是代表家庭和文明的安全领地”。<sup>②</sup>布里斯特德的《上流社会》被认为是一本了解老纽约社会的“启蒙教材”。<sup>③</sup>早在《豪门春秋》问世的30年前,他就在这部作品中揭示了19世纪中叶纽约时髦社会

① Stephen Greenblatt,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The Cultural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52.

② 莫里斯·迪克斯坦《途中的镜子:文学与现实世界》,刘玉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7页。

③ Elizabeth L. Bradley, "Dutch New York from Irving to Wharton," Cyrus R. K. Patell and Bryan Waterman (eds.), *The Literature of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5.



的风俗礼仪和极尽奢华,同时也流露出了他对本阶层的抨击和消解意识。但他的批判“格外温和”,<sup>①</sup>就像加入他喜爱的雪利可倍乐中的柠檬片,对饮品的口感丝毫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发表于世纪之交的另外三部作品也是从不同于《华》和《豪》的角度观察纽约,它们的焦点是贫民窟和罢工,是中下层人群的生活状况和工作环境。豪威尔斯的主人公是一位来自波士顿的杂志社编辑,在对待工运问题上,他与华尔街老板意见分歧很大。作品中许多地方体现了作家希望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愿望。《街头女郎梅吉》以纽约廉价公寓为背景,讲述一个从贫民窟走出的女子如何堕落为妓女的历程。作家揭露了纽约上流社会的丑陋,表达出作者对下层社会的同情。卡恩作为19世纪著名的犹太裔作家,他的作品更关注纽约世纪之交时的移民潮问题。移民之间的文化冲突和由移民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是卡恩创作的素材。另外,由于这三部作品的作者都不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他们对纽约的观察没有詹姆斯和华顿直接,对它的诠释也缺少一些局内人的敏锐和深入。

除了《华盛顿广场》和《豪门春秋》,詹姆斯和华顿一生中還创作了其他以纽约为题材的小说。尽管这些作品大都侧重于纽约的传统贵族社会,但由于创作的历史语境和作家的人生境遇不同,每部作品所表现的纽约也不尽相同。《华》是詹姆斯唯一一部以具体地理名称命名的纽约小说,是作家对19世纪中叶变革中的纽约的无奈和抵触。科尔姆·托宾(Colm Toibin)盛赞《华》是詹姆斯最好的一部短篇小说,也是他最杰出的作品之一。<sup>②</sup>华顿创作的近20部以纽约为素材的故事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长篇小说《豪门春秋》、《纯真年代》(1920)和中篇小说集《老纽约》(1924)。其中,为华顿赢得普利策大奖的《纯真年代》被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是她的巅峰之作。但由于这部作品和《老纽约》一样,都是华顿经过一战的残酷洗礼后对纽约的再度反思,因而作品更多体现了作家对正在消失的老纽约的哀挽之情,她对纽约19世纪巨变的态度也远不如战前作品中所表现的那样鲜明和排斥。《豪》这部小说不仅奠定了华顿在美国文坛的地位,也是作家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与权力话语抗衡的经典作品。此外,华顿的《纯真年代》和《老纽约》中收录的四个中篇小说大都取材于19世纪70年代的纽约,无论在城市扩展或是阶级分化上,此时的纽约远没有《豪》中那么成熟,与《华》中的纽约差距不大。因此,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将《华》和《豪》中的纽约作为文本进行比对诠释,能够更加全面地揭示19世纪两大转型期纽约的城市巨变,以及伴随这些变革的阶级等级分化。可以说,两位作家合力为19世纪变化中的纽约刻画了一副完整的图画。他们再现了两大转型期纽约社会新贵与旧豪,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等级差异和紧张局势,暴露了作家的个人意识与主导权力话语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是,詹姆斯和华顿将纽约时代变迁时的阶级格局与其网状街道布局绝妙地联系在一起,字里行间处处渗透着自己对社会变革的彷徨、不满和抵触。但是,由于他们无法与正在改变这座城市的强大力量相抗衡,虽然都试图消解主流话语,但最终都无能为力。凯瑟琳在华盛顿广场孤独终老,丽莉也在下层的贫民窟中悲惨地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责任编辑 赵枫)

① Caleb Crain, "The Early Literature of New York's Moneyed Class," Cyrus R. K. Patell and Bryan Waterman (eds.), *The Literature of New York*, p. 94.  
② Colm Toibin (ed.), *The New York Stories of Henry James*,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 2006, p. 17.

the endeavors of the scholars of literature with Confucian tradition in folk education. There were two schools of Confucian thoughts of this period ,one of which ( represented by Zi Xia) devoted itself to the publicizing of Confucian doctrines and folk education.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ethics ,the scholars of this school emphasized *li* ( rituals) ,and were very prudent and cautious in politics.

### **Laws and Vagabonds in the Ming Dynasty**

WU Yan-hong

As a social group of a special kind ,vagabonds were never defined in the Ming Laws ,and yet it does not mean they were beyond the legal perspectiv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the Ming Dynasty ,crimes committed by the group of vagabonds were to be punished though the severity varied in different social contexts with different social control purposes. Drawing on the Ming legal documents ,this essay trie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this social group was legally defined and discussed; what regulations were enacted for this group; how those legal rules were practiced; and what changes occurred throughout the Ming Dynasty regarding the above aspects.

### **Unquiet Slumbers in That Quiet Earth: Racial Politics in *Wuthering Heights***

WANG Ping

The Irish connections in *Wuthering Heights* and the political intentions of it have largely been ignored. If it is read in the context of 1840s and of Bronte family background ,it may show many characteristics of a full-blown allegory of Anglo-Irish relations. In the paper ,Heathcliff is recognized in the context of Anglo-Irish conflicts and from the neo-historical and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 ,so as to examine his dissimulation ,degeneration and mimic rebellion. It also tries to make clear how “narrative of a nation” and “double versions” work in Bronte’s writings ,so as to dig out the mechanism of modern literature.

### **New York City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ashington Square* and *The House of Mirth* in the Neo-historicist Perspective**

WEI Zhao-xia ,WANG Fang ,JIN Rong

*Washington Square* and *The House of Mirth* are Henry James’ and Edith Wharton’s early works ,which strengthened the mainstream literary discourse of that historical period in their narrations of social classes in relation to the urban development during the two major social transitions in the 19th century. To contradict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with their personal thinking and awareness expresses their desire to topple down the prevailing discursive power. The endeavor of this kind in their writings is eventually contained by the dominant discursive power.

## 本刊启事

本刊全文资料已加入中国知网,并提供读者服务,如作者有异议,请来函说明,本刊可作适当处理。